

创立科学共产主义是集体的智慧

陈学裕

科学共产主义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表明马克思在系统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中是功绩卓著的。但能不能因此断言,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参加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活动呢?不能。因为,参加科学共产主义创立的,除了马克思、恩格斯外,还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有的还作出了比较大的贡献。所以,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是集体的智慧,是共同劳动的硕果。

(一)

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不是个别的人物,而是一大批,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从十九世纪初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完成或接近完成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地表现出来。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人运动表明,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无产阶级就需要自己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渴望产生自己的政治代表,要求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以便有成效地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如果在一个国家内只有一两个,在整个西欧只有寥寥几个,这显然是满足不了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

任何革命理论的产生,总是客观物质世界的一种反映。客观存在的事物,必然要反

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它通过人的思维,产生概念和理论。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观事物,总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头脑中来。由于各个革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实践情况有别,理论修养有差异,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会完全一致,有的较浅,有的较深,有的比较片面,有的比较全面。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修养好,因而站得高,看得远,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较其他革命家深刻些、全面些,所以他们两个在系统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中贡献最大,这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中无所作为,这也是违背辩证法,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个先进阶级的思想体系,内容极其丰富,它包括社会、自然界、人类思维等全部内容。创立一个先进阶级的思想体系,也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因此,仅只一两个革命家、思想家孤军奋战是无法完成的,必须靠这个阶级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齐心合作,共同努力,才能系统、全面、完整地创立出来。

总之,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使得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十九世纪如灿烂群星涌现了出来。这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除举世闻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外,比较著名的还有: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弗里德

里希·列斯纳、格奥尔格·维特尔、裴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约翰·菲利浦·贝尔克、奥古斯·布朗基、乔治·朱利安·哈尼、厄内斯特·琼斯等。在这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中，虽然有的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个别的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他们仍不愧为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在科学共产主义创立中，都作出过不同程度的贡献。

(二)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他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是十九世纪不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的认识。被马克思誉为“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脑和心脏”的布朗基(1805—1881)，早在十九世纪30年代，就已经从经济上、政治上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斗争。他在1834年写的《谁做的汤应谁来喝》一文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少数人利用占有的生产资料剥削工人，从而造成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他说：“资本本身是不能生产的，它只有在劳动力的作用下才能生产。”由于工人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只好为少数资本占有者的利益而被迫劳动”。可是，劳动的果实却“不属于劳动者，而属于游手好闲者”，这犹如“黄蜂吃掉蜜蜂所生产的蜂蜜一样”。至于资本占有者给工人的工资，布朗基认为是资本家为了“使工人不致饿死”，“使得被剥削者能够生儿育女”，以便“延续穷人的血统为富人服务”，如果资本家不这样作，靠剥削为生的资本家，也就无法生存下去。布朗基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压迫剥削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工具。1832年1月20日，布朗基在刑事法庭的答辩中指出：资产阶级政府是一台抽压机，资产阶级利用“这台抽压机压榨人民的血汗，榨取亿

万法郎，使之不断流进游手好闲者的钱柜。这台无情的机器一个一个地压碎二千五百万农民和五百万工人，吸出他们最纯洁的鲜血，把它输送到特权分子的血管里去。”资产者把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集中在一小撮为了共同利益而结合起来的特权阶级手里！”由政权垄断者选出的议院“制订税法、刑法、行政法，所有这些法律，同样是为了达到掠夺的目的。”资产阶级建立的“最残酷的暴政”，对工人“有生杀予夺之权！”这就较为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

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才能解放全人类，自己也才能获得解放，这是无产阶级长期斗争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无产阶级如何夺取政权？这是当时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或发表演说，或伏案挥笔，都在为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作出自己的贡献。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1812—1870)，在1847年2月8日庆祝伦敦教育协会成立7周年的宴会上，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式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他说：“如果有可能，我们应该用和平的手段”争得民主自由；“如果我们的敌人用刀枪来反对人民的意志”，“我们将采取暴力的办法来实现人民的愿望。”可见，沙佩尔认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和平的手段夺取政权，但是，当资产阶级用暴力来镇压人民时就要针锋相对，以革命的暴力回敬它。沙佩尔关于用两种方式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恩格斯在《国内危机》和《共产主义原理》等著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完全一致。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四十年代的著作中，多次阐明过，特别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提出了“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然而，应该看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其他革命家也有过不少论述，有的是几乎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讲

的。1850年4月中旬，“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马克思、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参加该协会）通过的由维利希起草的协议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协议第一条指出：“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著名的国际活动家魏德迈（1818—1866），在1852年1月1日的《纽约体育报》上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文章指出：

“无产阶级的统治和残忍的破坏主义的统治毫无共同之点：无产阶级是唯一能把资产阶级的全部遗产推向前进的阶级，因为它自身的繁荣也是以这个遗产的将来发展好坏为转移的，它是行使统治的最后一个阶级，由于废除了这一切特权，将使所有其他阶级都消灭在这个阶级中，因为它已经吸收了其他阶级所有创造因素，这些因素对历史上获得了理论上的了解……”。魏德迈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区别于其他阶级统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比资本主义进步、优越；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消灭特权，消灭阶级，因而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的统治。魏德迈所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其基本观点同马克思两个月后致魏德迈的信中阐明的思想，很多都是相同的。

工农联盟的理论，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曾被恩格斯誉为“非凡的人物”的沃尔弗（1809—1864），是一个由农奴的儿子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工农联盟的原理就作过不少精彩的论述。1847年8月1日，他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的《农民与政治运动》一文中说，农民对封建领主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愤懑胸怀，可是地主又总是力图把农民的仇恨转移到城市。城市和农村的这种分裂，是德国政治发展的障碍。“如果我们想迅速地和顺利地推翻我们心爱的德意志‘祖国之父’的当今

的统治制度，我们就必须在乡村中进行鼓动……只有城市和乡村团结一致、共同行动，我们才能一举而将‘基督教日尔曼’以及整个德意志中世纪的国家经济抛到历史仓库最偏僻的角落去，并且在这个‘上帝保佑’的国家里建立起一个‘人民保佑’的国家。”显然，提出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这一原理，沃尔弗比马克思、恩格斯都早一点（恩格斯是在1848年1月写的《1847年的运动》一文提出工农联盟思想的）。沃尔弗还是第一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深刻揭露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的战士。从1848年12月起，他就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特别是1849年3月22日至4月25日发表在该报上的八篇文章，极其深刻地揭露了封建领主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和普鲁士国家对农民的残酷压迫。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篇文章都非常称赞。正是由于沃尔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卓越的贡献，所以马克思才把《资本论》第一卷献给他，并称他为“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价值无比的人”。另外，被马克思称为“先进战士”的莫尔（1813—1849），在1848年9月3日科伦举行的工人联合会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也曾说：“联合会必须担负起这样一个义务：到郊区去对农民和手工业工场工人发生影响，帮助他们在农村里建立联合会，并和他们保持经常联系。”以莫尔为首的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在科伦郊区的工人和农民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恩格斯称为“老近卫军”的施拉姆（1822—1858），不仅投身到1848年—1849年西里西亚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中，把他全部旺盛的精力、饱满的热情都用来做农民群众的工作，而且在1850年10月19日的《红色共和主义者》上发表文章说：“也许，若干年的丹麦人的统治和俄国人的作威作福会告诉他们（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斯坦的农业工人）‘在他们同德国无产者结成紧密联盟以前，他

们永远也不能得到解放。”由于当时德国和法国革命运动高涨，这两个国家的居民中，农民又占主要成分，因此，当时研究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关系的革命家也不少。所以，对工农联盟问题，除马克思和恩格斯外，其他革命家也有不少论述。

国际主义原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原理。沙佩尔在1844年9月22日的一次集会上发表的长篇演说中，就提出和阐述了国际主义原则。他认为，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各国社会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必须紧密团结起来，各族人民必须友好。在1846年3月25日的一次集会上，他把波兰和意大利都视为受压迫、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国家。因此，他极其鲜明地提出：德国人“当他们取得自由的时候，他们首先要利用自己的自由把从波兰和意大利夺去的那些省份归还它们。”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9日伦敦举行的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17周年的国际大会上说：“任何民族当他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因此，不把波兰从德国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德国就不可能获得解放。”沙佩尔和恩格斯都宣扬发挥国际主义精神，主张把波兰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沙佩尔提出的时间，比恩格斯早一年零八个月。

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后，应该建立什么社会，它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怎样？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有过一些设想，其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过一些探索和描绘。宪章派领袖琼斯(1819—1867)，在1852年6月5日的《人民报》上指出，在实现遥远的共产主义以前的未来社会里，一个人有可能“自己享用自己劳动的果实，为此则只须付出正好用他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等值所必需那样多的劳动，而这另一个人的劳动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调节。”琼斯在这里已经有了下述思想的萌芽：推翻资本主义后，还不能马上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在实现共产主义

之前的未来社会里，将可能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其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将是等量劳动换取等量产品的分配制度。

沙佩尔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批判魏特林主义时，曾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问题，作了可贵的分析。1845年9月，他在伦敦教育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人民只能在劳动中找到幸福，劳动和享乐是相互交替的，而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幸福。任何强制手段都是不需要的，因为人并不是懒惰的；如果人受到应有程度的教育，他是会愉快地劳动的。”沙佩尔把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同思想觉悟的极大提高和高度科学技术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从而得出劳动是幸福的结论，这是很有卓见的科学分析。毫无疑问，沙佩尔是最早论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问题的一个革命家。

无数雄辩的事实证明，科学共产主义基本原理的创立，除马克思、恩格斯作了主要的杰出的贡献外，其他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因此，创立科学共产主义应当是集体的智慧。

(三)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这当然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他们的杰出成就，正是在于他们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体系的过程中不仅学习了前人的经验，而且也吸取了当时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总是以严谨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对很多问题，除了他俩彼此切磋外，还同其他革命家共同研讨，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当马克思听了德国杜塞尔多夫工人代表勒维关于拉萨尔的情况报告后，他并没有立即表态，除了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外，还明确表示：“我很想知道布鲁斯（即沃尔弗）的意见。”1858年6月7日，马克思在

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如何看待拉萨尔同法布里策决斗等问题时，再一次明确表示：“未收到你和布鲁斯的意见之前，我不能作答。”当6月9日，恩格斯把自己和布鲁斯的意见函告马克思后，马克思才把他们三人共同的意见告诉了拉萨尔。恩格斯是军事科学知识比较丰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但他在军事科学研究过程中，也是以小学生的态度，恭恭敬敬地向有实践经验的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吸取他们的研究成果。1851年，恩格斯从事军事科学研究时，关于拿破仑战争和部分革命战争的细节，关于一些战役的细节，关于各军事部门的知识以及正确评价历史事实的详细知识，关于基本战术、筑城原理、堡垒的各种体系、野战工事、军事工程、军事科学史等等问题，他都向魏德迈请教。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魏德迈坚决支持林肯废除奴隶制的主张，亲自参加对奴隶主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他历任参谋、炮兵中校指挥官、步兵团长、分区司令等要职。他把自己在战争中的实践经验介绍给恩格斯，特别是把他对各种战略战术的研究成果以及美国野战炮的种类及其性能向恩格斯作了详细介绍，使恩格斯受益不浅。恩格斯在1865年3月10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说：“我感谢你关于美国武装力量的情况的说明，幸亏有了它们，才使我对美国战争的许多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轮廓。”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在恩格斯关于军事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中，有魏德迈的一份功劳。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凝聚着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还表现在其他革命家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书立说搜集素材、提供资料上。为了使马克思、恩格斯把有限的精力和宝贵的时光集中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研究上，有些革命家甘当材料员、记录员。1852年5—6月，沃尔弗、弗莱里格拉、德朗克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一道，为马克思、恩格斯写《流亡中的大人物》搜集材料。1852年

秋，发生了“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留居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花了很大的力量来揭露警察的挑衅。德朗克等人揭露了捏造“罪证”的帮凶、普鲁士警察弗略里。他们把这些素材提供给马克思，使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写得生动、具体、有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该小册子中，多次提到德朗克的名字，以示谢意。

创立科学共产主义是集体的智慧，既是历史事实，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完全归为个人的功劳。马克思在谈到他同恩格斯、沃尔弗等人批判正义者同盟的秘谋学说时说：“我们提出把对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科学研究作为唯一牢靠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可见，用科学共产主义代替魏特林的秘谋学说，不是马克思一个人的主张，而是包括恩格斯、沃尔弗等人的共同主张。恩格斯在谈到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贡献时说：“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在这里，恩格斯肯定了马克思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也肯定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我们”即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是能手”。马克思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文版导言》中，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悼词》草稿中，称“卡尔·马克思是百年少有的杰出人物之一。”都没有用“唯一”的称谓，而是用“之一”，这是他们尊重历史事实的科学精神的突出表现。

我们说科学共产主义是由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努力创立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并不是说每个革命家在里面起的作用都相等、贡献都一样。毫无疑问，在这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理论修养最高，

（下转第33页）

不同的语言因素，自然、和谐地熔为一炉，构成浑然的艺术整体，产生感人的艺术魅力。

无论《诗》、《书》、成语，还是童谣、民谚，都是古人或今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特别是来自民间的成语、谣谚，是人民群众以凝练而形象的语言，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所作的概括和总结。它们长期活在人民群众的口头，不愧为最有生命力的艺术语言的一部分。在《战国策》中，如：“三人成虎，十夫揉椎。众口所移，毋翼而飞。”（《秦三·秦攻邯郸》）“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秦三·蔡泽见逐于赵》）；“行百里者半于九十”（《秦五·谓秦王》引逸《诗》）；

“骐驎之衰也，弩马先之；孟贲之倦也，女子胜之。”（《齐五·苏秦说齐闵王》）“大冠若箕，脩剑拄颐，攻狄不能，下垒枯丘。”（《齐六·田单将攻狄》引“齐婴儿谣”）“挈瓶之知，不失守器”（《赵一·秦王谓公子他》）；“以书为御者，不尽于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赵二·武灵王平原君闻屈》引“谚”）“色老而衰，知老而多”；“并骥而走者，五里而罢；乘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赵三·或谓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骐驎不至。”（《赵四·秦攻魏取宁邑》）“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口铄金”（《魏一·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乌获

举千钧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燕一·苏代谓燕昭王》）这些生活气息浓郁，且富于表现力的语言，既通俗、形象，又生动活泼，焕发出朴素而迷人的艺术光彩。如此佳语妙句，在《战国策》中，令人似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

生动形象、敷张扬厉、明畅通俗三大特色融为一体，形成了《战国策》语言辩丽横肆的艺术风格。尽管《战国策》非出一人之手，但其作者可肯定为纵横家或习纵横者，他们的思想倾向基本一致；而且其书几经后人整理，因而在总的语言风格上，还能大体保持统一。文学史的实践证明，伟大的作家在一个总的风格统摄下，往往兼有几幅笔墨，俱臻佳境，各显其妙。就一个作家而言尚且如此，毕竟非一人所作的《战国策》，其语言风格在大体统一的前提下，显示出多样化的倾向，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刘熙载说得妙：“《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旋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艺概·文概》）至若苏、张说词之恢宏奇伟，庄辛设喻之潜隐迂徐；鲁连拙辛垣衍之雄骏恣肆，触龙说赵太后之婉曲入情……，无不匠心独运，特色鲜明。多姿多采的语言艺术风格，标志着《战国策》的语言艺术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上接第16页）

观察和研究客观事物最深入细致，因而是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对科学共产主义体系的创立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比作一部机器的制造，那么，其他革命家只是为这部机器分别制造了个别部件，而马克思、恩格斯则是这部机器的总工程师，并为这部机器制造了主要的部件。列宁说：科学共产主义“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347页），这是科学的评价。恩格斯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

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科学共产主义虽然是集体的智慧创立的，但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创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这也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